

世界文学视域下《文星》版梁译莎剧中 圣经典故注释研究

朱安博¹, 贺时纬²

(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2;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世界文学概念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 文章从莎剧中的圣经典故翻译切入, 论述莎剧翻译在世界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的跨文化价值。莎剧作为世界文学经典, 不断被翻译、改编、上演, 形成具有活力的复数“世界文学”, 兼具权威性与经典性。圣经典故注释作为梁实秋莎剧汉译本中独特的副文本因子, 是联系作者、译者、读者的重要枢纽, 在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中不容忽视。文章从世界文学的视角, 对《文星丛刊》版中的圣经典故注释所体现出的功能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 指出梁译莎剧通过对圣经典故注释这种跨文化阐释的策略, 对莎剧进行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构。

[关键词] 世界文学; 《文星丛刊》; 圣经典故注释; 汉译莎剧; 梁实秋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3-0095-09

一、引言

18世纪70年代施勒策尔将“世界文学”的概念引入欧洲^[1], 1790年维兰德在他有关贺拉斯《书札》的翻译手稿中使用“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2], 1827年1月31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歌德同爱克曼的谈话中, 由此歌德参与并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歌德是在阅读中国小说时意识到在东西方文学中拥有共同性的感受, 整个人类是一体的、相通的, 因此表达了一种愿景。这就是《歌德谈话录》的那一段话: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 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 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特殊的文学, 奉它为模范。”^[3]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 “世界文学”命题被不断提起、阐释, 甚至重新定义。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不应只为文学, 还应为一个不断欢迎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4], 这突出了

[收稿日期] 2021-08-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批评史”(15BWW04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十七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副文本研究”(2020KJCX01051)。

[作者简介] 朱安博(1972-), 男, 安徽萧县人, 文学博士,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莎剧汉译批评研究。

贺时纬(1996-), 男, 河北香河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概念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导向性。同时,以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为先导,达姆罗什的《怎样阅读世界文学》(2009)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文学”给以新的理解。其中尤其以达姆罗什的解释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按照他的看法,“(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5]。他的解释是从文学的生产、翻译和流通的角度展开的,解决了世界文学的构成问题,即世界文学是发生某种“折射”的民族文学的汇集。他还肯定了翻译在重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且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研究审视世界文学。达姆罗什的阐释刷新了目前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议,也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文学重构”增加新的认知。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的观点肯定了翻译在世界文学经典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莎剧汉译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尤其是涉及到跨文化和跨文明元素的传递过程,需要译者深思熟虑,莎剧汉译中的圣经注释便是如此。圣经典故注释作为梁实秋莎剧汉译本中独特的副文本因子,是联系作者、译者、读者的重要枢纽,在翻译研究中不容忽视。既能保证译文的纯真性,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将文化负载性信息传递给读者,让他们体会到文化的异质性,促进文明、文化的交流沟通。

二、莎剧中的圣经典故

《圣经》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与文学遗产,兼具宗教神学权威与文学作品的双重性质,具有深厚的认知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对于西方文学源头而言,“它不是单一的,是由希腊文明和基督文明两个相互对立而又互补的源头构成的”^[6]。希腊罗马神话与基督教经典《圣经》作为两大文明的产物,在西方文化史和文学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产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与动力。

莎士比亚戏剧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剧中技巧性地运用圣经典故和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为塑造人物形象、增添文化底蕴、展现作品价值创造了条件。伯格认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就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7]《圣经》为莎士比亚戏剧“提供了可供书写的事物”^[8];并且,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文学巨匠,深受圣经的影响。他在获取优秀资源的同时,又创造出世界文学史上为后世称赞追捧、阅读研究的文学经典。众所周知,《圣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莎剧也借用了大量《圣经》典故,这一特点是莎剧汉译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傅光明指出,“单从统计上看,或许莎士比亚比但丁更为虔诚,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源于《圣经》的母题、意象、典故、转义、隐喻、借喻、象征、引申、升华等多达八千余处……”^{[9]510}“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中,几乎没有哪一部不包含、不涉及、不引用、不引申《圣经》的引文、典故或释义”^{[9]28}。莎士比亚对圣经典故的巧妙化用,使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魅力无穷,耐人寻味,这促使各国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去阅读与研究,从而形成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局面。

“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既是一种在他生命过程中由耳濡目染而孕育成的自然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源自《圣经》文学并深受其滋养的艺术关系。”^{[9]32}可以说,《圣经》是我们了解莎翁、解读莎翁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阐释莎剧的重中之重。换句话说,没有《圣经》的滋养,便没有莎剧的产生以

及后世绵延不绝的圣经文学研究与莎剧翻译研究工作的进行。圣经文学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在“新文化运动”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内容和精神蕴涵,而且增强了宗教文学的文化活力和社会适应性,并给中国现代社会提供了社会观察及批评的新视域、新境界”^[10]。它是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向西方文学借鉴取经、丰富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圣经》包含丰富的典故,在莎剧汉译中既能做到对原作的“存真”,又能让读者得以理解,注释起到了跨文化阐释的功能和作用。

三、作为世界文学的《文星》版梁译莎剧

“莎士比亚如此有活力:在剧院、在流行文化中、在学者研究中……这个死去的作家是永恒的,在舞台上、在书中、在人们脑海中。”^[11]莎剧百年不衰,不断被翻译、阐释、改写,不断被搬上舞台、搬上银幕,跨越时空形成了世界性集体文化记忆,在不同的文化中形成了“复数莎士比亚”(Shakespeares)和“复数莎剧”(Shakespeareans)。莎士比亚戏剧由民族文学发展成为世界经典,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于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论译者和译本的数量,除了《圣经》翻译外,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作家、任何典籍堪与匹敌”^[12]。莎剧在中国的译介史已有百余年,经过长时间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译者和优秀的译本。作为译莎的杰出代表,梁实秋为中国莎剧百年译介与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译莎活动系统性、完备性显著,且历时长,是海峡两岸译莎界当之无愧的典范。自赴台后,梁实秋继续从事译莎事业,以惊人的毅力与坚守的精神,于1967年独自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值得一提的是,《文星丛刊》为梁译莎剧的出版与传播提供了平台,同时促进了台湾出版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文星丛刊》仿照英国企鹅、日本岩波等著名丛书,秉持“尽可能好的书,尽可能低的钱”的原则,出版了一系列价格低、易携带、易保存的经典书籍,为台湾知识分子和年轻学子带来精神给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文星丛刊》与《文艺创作》《自由中国》《文艺杂志》一样,为梁实秋稳步进入台湾文学场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新人文主义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星丛刊》版《莎士比亚名剧二十种》是梁实秋赴台后首次出版的莎剧译著,为之后《莎士比亚全集》译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意义不容忽视。从生成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文星丛刊》版《莎士比亚名剧二十种》作为梁实秋译莎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对于《莎士比亚全集》译本的生成史、传播史、发展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明晰的例言、翔实的序言、丰富的注释,这些是区别于其他译本的根本性特征。

梁实秋坚持“中和”之法,尽可能维持中西文化平衡,使译作呈现出独特的杂合性,加注是梁实秋莎剧汉译本的突出特点。注释作为重要的副文本元素,是翻译研究中副文本与深度翻译和伴随文本关注的契合点,由此可以看出,它在翻译中至关重要,不容忽视。孙致礼指出:“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艰涩难懂的原文做出各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13]但由于两岸在莎剧研究方面交流不够深入、台湾文献资源获取不便等原因,对《文星丛刊》版梁译本中的圣经典故注释研究仍有不足,需要进一步挖掘。

四、梁译莎剧中圣经典故注释及其功能研究

不管如何定义世界文学,翻译都是基础,或者说,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密不可分。一部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关键要看其能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媒介进行文本旅行,历经

时空考验,不断被重塑、被传播,这暗含着世界文学具备开放性、可译性、可塑性等特征。不可避免的是,文化的相对不可译性仍然是文学翻译的难题。跨文明、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在翻译过程中的价值缺失在所难免,也即存在不可译的情况,这尤其是在跨文化指涉和典故传递方面极其明显,但诸如序言、注释等副文本为弥合文化分歧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典故注释集文学与文化底蕴于一身,在翻译中尤为重要,因为“翻译经常处于中间状态,是游走于不同文化间的空间符号,这为文化杂合提供了先决条件,亦是不同文化间互动互补的表现形式”^{[14]12}。诚然,文学翻译的过程,是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与交融的运动,是跨文化交流沟通的过程。“翻译要么处于联系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15],这意在说明应在沟通交流、协商对话、矛盾化解中建立互动关系,维护翻译过程的完整性,保证翻译生态的和谐性,梁实秋在译本中便很好地协调了彼此关系。梁译本中的圣经典故注释,在莎剧的再生成与再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丰富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传递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读者与原作者和译者进行对话,了解西方文化的渠道。目标语读者在阅读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接触本真性的文化元素,这为世界文学增添了极大的活力。下面将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1. 阐释圣经条目,方便理解原文

例1 原文: O! that this too too solid flesh would melt,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a dew;

Or that the Everlasting had not fix'd

His canon gainst self-slaughter!^[16]

译文:啊,我愿这太,太,坚固的肉体消融分解而成露水!或是上天不曾订那教规禁止自杀!^{[17]23}

注释:禁止自杀的条文不见圣经,除十诫中之第六诫系泛指一般自然宗教言。^{[17]50}

世界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翻译必不可少,因此作为协调者的译者身兼重任,需要同时处理好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双重层面,以更好地完成再现原作“来世生命”的译者任务。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援引化用隐含圣经经文条目的词句,对源语文化读者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目的语读者来说则造成一定的理解上的困难,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疑惑与不解。梁实秋颇具比较文学意识,以加注的具体实践方式,援引圣经原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剧中的故事情节,明白戏剧中人物说话的用意,是投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补救性”措施,符合读者“期待规范”。

翻译莎剧等世界文学经典著作,他者文化元素的不可还原性在所难免,但同样需要引起重视,注释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保存文化的多样性,同时确保世界文学作品完成“文本旅行”。许国璋指出:“翻译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18]梁实秋在《翻译之难》中提到:“遇到引经据典的地方,应该不惮烦地去查考,查出来应加注释,使读者也能明白。”^[19]同时,梁实秋在《翻译的信念》中提出了十原则,其中的“7. 在文字上有困难处,如典故之类,应加注释;8. 凡有疑难不解之处,应胪列待考”^[20],都强调了译者在世界文学经典翻译过程中应该具有的素养——力争保存文化的本真。

2. 注解圣经典故,阐释人性道理

例2 原文: I never see thy face but I think upon hell-fire and Dives that lived in purple;
for there he is in his robes, burning, burning. If thou wert any way given to virtue, I would

swear by thy face; my oath should be: By this fire, that's God's angel, but thou art altogether given over and wert indeed, but for the light in thy face, the son of utter darkness.^[21]

译文:我看到你的脸就不能不想到地狱的火焰和穿紫色袍的财主;你看,他在那里穿着他的袍子,烧呢,烧呢。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向善之心,我愿指着你的脸起誓;我的誓词将是:我当着这把火,那是上帝的使者,但是你是完全不可救药的了,除了你的脸上有一点光明之外,你会是纯粹的黑暗的儿子。^{[22]110}

注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二十三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侈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22]121}

通过观察上下文的情节发展,此处场景发生在野猪头酒店,此话是孚斯塔夫对巴多夫的回答。孚斯塔夫的生活主要是酒和女人,那喝酒的钱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坑蒙拐骗与偷盗。从前文(剧本中)与巴多夫的对话可以看出他的“作案”情节;从后文(剧本中)与魁格来夫人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欠钱赖账是常有的事。所以莎士比亚在此处运用财主与穷人的典故,目的是反映人性,告诫人们要有节制,摒弃好吃懒做的恶习。这也正是莎剧中世俗的显现,也是对圣经典故的巧妙化用,通过小事件引出大道理。

正如前文所述,《圣经》传递友善博爱的思想,“人性”这一概念在各民族文化中均会得到回声。莎剧之所以能够从民族文学中脱颖而出,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反映出世间普遍的人性,引起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共鸣,并从中受益,这也符合梁实秋信奉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莎剧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者理应在译文之外添加注释,一方面便于阅读,一方面传递道理。“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结构在目的语中必须重建,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也必须在另一语言所积淀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3]因此,通过添加译注,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参透人物形象,起到启发读者、提高读者认知能力的作用。同时,“财主”这一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人物形象的运用,可以引起读者的某种共鸣,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余光中也认为:“有些译者在译文之后另加注解,以补不足,而便读者,便有学者气象。……原文若是经典名著,译者这样郑重对待,诚然是应该的。”^[24]

例3 原文:And let this world no longer be a stage

To feed contention in a lingering act;

But let one spirit of the first-born Cain

Reign in all bosoms, that, each that heart being set

On bloody courses, the rude scene may end,

And darkness be the burier of the dead!^{[25]28}

译文:这世界不要再像个舞台似的,演着冗长的戏,来喂养战乱的精神,让初生的凯恩的精神盘踞在每人的心里,每颗心都坚决地怀着杀机,为的是让这残酷的情况早早结束,让黑暗掩埋起所有的死者!^{[25]29}

注释:凯恩(Cain)圣经中亚当夏娃之长子,杀死胞弟亚贝耳(Abel),此地代表凶杀之精神。^{[25]240}

这段话是毛尔顿从舒斯伯战场逃回,脑赞伯兰得知自己儿子死后所说。这反映了战争带来的厮杀,令社会动荡不安,人人心存杀机。莎士比亚在这里化用凯恩杀死亚贝耳的原型典故,巧妙地

映现出当时的社会状态,意在告诫人们要维护和平,放弃战争。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等剧中驾轻就熟地化用了《旧约·创世记》中“该隐杀弟”的原罪典故,这为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上提供了支撑材料。兄弟残杀的原型故事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梁实秋在此添加反映异质文化的注解,能够帮助读者有效地扫除知识盲区,提高自身的认知。这既能满足读者需求,又能够传递西方文化知识,体现了译者的责任感。文化负载词的引入不仅能够梳理故事情节,同时还能丰富译入语的词汇,这正是文化距离带来的好处,使得源语文化传递到他者文化,从而能够起到跨文化沟通交流的作用。

又如《恶有恶报》第一幕第二条之注释:“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十六节:‘人未有燃灯而藏之于斗下者,毕置之于槃上,用烛全室。尔之光辉,亦当烛照世人……’”^[26]

梁实秋对人性的追求反映在译本中,该条注释也很好地展现了莎剧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这也正是莎剧的独特魅力所在。梁实秋认为:“世界上的人对真正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有不可磨灭的热爱的……莎士比亚之永久性与普遍性是来自他的对人性的忠实的描写。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27]文学是具有教化作用的,通过翻译传达原作的人文价值能够起到启迪读者的功用。

世界文学经典在文本旅行的过程中总会有所损失,但也会有所获益,获得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认同与理解,以及跨文化的阐释。傅光明认为:“若想真正步入、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从阅读上来说,势必离不开丰富注释和翔实导读,这不失为解读、诠释莎剧的一把钥匙。”^[28]梁实秋以加注方式传达出自己的声音,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与译者诗学观的体现;同时这又体现了他“求真”基础上“务实”的翻译观。

3. 指明引文出处,帮助阅读研究

例4 原文:Is the generation of love? hot blood? hot thoughts, and hot deeds? Why, they are vipers: is love a generation of vipers?^[29]

译文:恋爱是这样产生的么?热情?热烈的念头,热烈的行为?噫。那都是毒蛇:恋爱便是繁殖毒蛇么?^{[30]95}

注释:参看圣经 Acts xxviii,3: “there came a viper out of the heart.”^{[30]121}

又如《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第四幕第八条之注释:“原文 what shall be done to him……是圣经用语,=what honor shall he receive? 见 Samuel I. xvii,26.”^{[30]161}

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世界文学,要保证阅读性与研究性的统一。“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就语言来说,它要求熟谙本国语和外国语以及他们背后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涉及广泛的文化修养;在文学内部,翻译又居于创作与研究之间,既要有创造家的创造性,又不可离开原作;既要有研究家的深入理解又不能故弄玄虚。它经常处于创造与模仿、本能与规律的张力之间。”^[31]梁实秋作为一名“学者型”译者,研究性工作必不可少。添加圣经注释,指明原文的出处,不仅对自身翻译过程有作用,同时对于读者与研究而言也是一种补偿性满足。艾布拉姆斯(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批评四要素,即作品、宇宙、艺术家与观众^{[32]6},其中作为观众的读者占有一席之地;他同时将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称为“实用论”^{[32]15}。

译注不仅是对原作的补充与延伸,而且是对译语读者的关照与呵护,契合读者的情感期待。源语文化信息对于译语读者是一种缺失,译者的注释是对文化缺省的一种补偿,对于介绍西方文化、

提高读者的文化水平、搭建中西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实秋对莎剧中的圣经典故的翻译与注释,既保证了译本的可读性,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研究性,使读者能够领略经典文学经久不衰的魅力。笔者认为,梁译本坚持了译意与译异的统一,在多元文化社会的今天,梁译本仍具有现实意义,对异质文化的传递仍能符合读者需求。

4. 借用圣经典故,传递文化习俗

例 5 原文:Yes, to smell the pork; to eat of the habitation which your prophet the Naz-
arite conjured the devil into. ^{[33]36}

译文:对了,好去闻猪肉味;去吃你们的先知拿撒莱兹人令恶魔附体的猪。 ^{[33]37}

注释:犹太人不食猪肉。拿撒莱兹人即是耶稣,他令在两个人身上的恶魔附在猪身上去。

见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节。 ^{[33]197}

这句话是夏洛克对巴珊尼欧吃饭邀请的回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夏洛克的讽刺口吻,和耶稣教徒一起吃猪肉是不可能的,这是西方宗教习俗的体现。这里莎士比亚化用了耶稣驱鬼的故事。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化用、妙用圣经典故,增加了文化厚重感,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是一种考验,但梁实秋通过添加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缩小文化间距,领略异域文化之美。

恩贝托·艾柯(Umberto Eco)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在于减少差别,而在于更多地发现差别。”^[34]如果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差异的存在,那就没有了对话协商的过程,正是差异为双方创造了对话的条件,拓展了双方的对话空间,使得双方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圣经典故注释为读者与原文和原作者的互动提供了条件,这能够营造一种良好的阅读体验,不仅让读者领略到异域文化带来的陌生差距美,同时为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习俗、社会历史等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因此,与其说翻译是译意与译艺的过程,不如说是译异的过程。

其实,“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在语言的差异,而是在文化的距离……”^[35]“文化距离会给译作带来陌生感和离间感,缩短文化距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增加对外来文化的接触,无疑有助于文化距离的消解”^[36]。Casagrande 也认为:“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37]翻译本来就是一种运动的状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体现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38]。“翻译的基本活力,或者说翻译的根本伦理,就是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体现异质性。”^{[39]203-204}译者通过加注等手段调和两种文化,摄取源语文化中的优质成分,传递到译入语文化中,以形成两种文化的和谐生态。同时加注能引导读者体会到莎剧独特的审美力量,即“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40]。

间距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包容性、对话性、生发性与建构性力量,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敞开性对话”与“广义对话”提供某种可能,使双方跨越文化间距,既能有受益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孙致礼认为:“我国 21 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调,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41]保持异质特性,避免同质混乱,维护多样性,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对话中需要牢记的,也是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坚守的原则。

总的来说,圣经典故注释具备以下四大功能——(1)弥补延伸功能:注释能够突破原文的局限,解释文化深层内涵,这能有效地缓和文化缺位,实现文化增值,提升读者的文化水平。(2)阐释建构功能:通过注释译者能充分解读原文,重构译文语境,同时能再塑原作经典性,提升译作经典地位,

建构自身形象。(3)考据研究功能:译注有助于读者获取考据性信息,开展研究工作,同时能展现译者所做研究性工作的充分性与严谨认真的态度。(4)沟通传播功能:译注能建立译者—读者—作者交流平台,同时能联结中西文化,谋同存异,保证文化多样性。

翻译作为一种双向的交际活动,需要双方能够尽可能地通过沟通协商的过程,从对方的差异中找到共同的话语,实现一种共生共享,这有利于“不同文化话语互照互释,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从差异中看到彼此,尤其是自身文化与思想的‘原始褶皱’”^[4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添加注释可以搭建沟通协商的平台,尽可能地通过对话补偿文化损失,缩短彼此之间的间距,以更好地使译本能服务于目标语读者,为他们带来文化上的奇特体验。莎士比亚运用圣经典故,对于深化戏剧主题、刻画人物形象、丰富文化底蕴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跨文化交流传播的介质,翻译具有沟通对话、互动协商与文化传播的多重性质。

五、结语

注释,尤其是圣经典故类注释,作为重要的副文本元素,其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是译作中不可或缺的。对于原作者来说,这使原文生命得以延伸;对于译者来说,这是主体性、能动性与责任感的展现,为进行“再创作”创造机会。对于源语文化来说,这是文化知识传递的途径,致使源语文化在异域焕发出新的生机;对于译语文化而言,这是吸收、借鉴他者文化,改善、提升自身文化的有效途径。阿皮亚指出:“通过注释和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对他者文化给予真切的尊重。”^[43]《圣经》具有经典性与思想性,属于所有时代,也是莎士比亚戏剧至关重要的组成元素,在莎剧汉译过程中同样不容忽视。莎士比亚对圣经典故的巧妙化用增加了戏剧的厚重感,使得故事情节深化丰富、生动有趣、文化底蕴浓重,同时对增强语言感染力、刻画揭示人物性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译者通过大量的注释,既能秉持求真务实的翻译态度,又能弘扬莎剧的精髓、保持对原作的尊重。

翻译不仅是历史的映像,更是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世界文学经典文本能够在不同时代生成既基于前人成果、又能够与译者所处时代相弥合的新译本,具有动态历史性、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的表征。莎剧正是如此,在时代发展与文化转型的全球化语境下,在世界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增值,是名副其实的复数“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本文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对《文星丛刊》版中的圣经典故注释所体现出的功能价值进行分析探讨后得出:梁译莎剧通过对圣经典故注释这种跨文化阐释的策略,使莎剧兼具动态与静态的双重特征,前者在于莎剧在国际性翻译、流通、传播的过程中,处于富有活力的状态,生生不息;后者在于莎剧的版本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生成,凸显普遍性价值,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 [1] 方维规. 何谓世界文学[J]. 文艺研究, 2017(01): 5—18.
- [2] 姚达兑. “歌德与世界文学”事件及其理论启示[J]. 长江学术, 2020(03): 87—97.
- [3] 爱尔曼.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13.
- [4] Moretti F.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J]. New Left Review, 2000(01): 54—68.
- [5]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81.

- [6] 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
- [7] 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64.
- [8] 莱肯, 梁工. 圣经与文学研究[J]. 圣经文学研究, 2007(00): 1—17.
- [9] 傅光明. 天地一莎翁 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 [10] 卓新平. 圣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J]. 圣经文学研究, 2011(00): 1—10.
- [11] Simon P, Emma S. Shakespeare's dead[M]. Oxford: Bodleian Libraries, 2016.
- [12] 黄国彬. 汇入莎士比亚的海洋[J]. 东方翻译, 2012(01): 62—69.
- [13] 孙致礼. 翻译与叛逆[J]. 中国翻译, 2001(04): 18—22.
- [14] 孙艺风. 翻译与多元之美[J]. 中国翻译, 2008(04): 10—19.
- [15] Berman A. L'épreuve de L'étranger[M].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84: 16.
- [16] 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38.
- [17] 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M]. 梁实秋, 译. 台北: 文星书店, 1965.
- [18] 王克非. 阐释与显化—许国璋翻译思想解析[J]. 现代外语, 2015(06): 859—862.
- [19] 黎照.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7: 617.
- [20] 刘炎生. 雅舍闲翁—名人笔下的梁实秋 梁实秋笔下的名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51.
- [21]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 上[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152.
- [22]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 上[M]. 梁实秋, 译. 台北: 文星书店, 1964.
- [23] 许钧. 翻译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50.
- [24]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172.
- [25]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 下[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 [26] 莎士比亚. 恶有恶报[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208.
- [27] 梁实秋. 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1—2.
- [28] 傅光明. 戏梦—莎翁 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3—4.
- [29] 莎士比亚.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122.
- [30] 莎士比亚.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M]. 梁实秋, 译. 台北: 文星书店, 1964.
- [31] 叶芝. 驶向拜占庭[M]. 袁可嘉, 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5: 12.
- [32]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33] 莎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2001.
- [34] 乐黛云, 李比雄. 跨文化对话 4[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2.
- [35] 王克非. 翻译需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来认识[J]. 外国语, 2014(06): 52—54.
- [36] 孙艺风. 翻译的距离[J]. 中国翻译, 2013(06): 5—12.
- [37] Casagrande J B. The ends of trans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54, 20(04): 335—340.
- [38]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2.
- [39] Gouvanic J M. Ethos, ethics and translation: Toward a community of destinies[J]. The Translator, 2001, 7(02): 203—212.
- [40] 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3.
- [41]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01): 40—44.
- [42] 于连, 马尔塞斯. (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M]. 张放,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12.
- [43] Appiah K.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 16(04): 808—819.

(责任编辑: 程晓芝)

(下转第 116 页)